

网络舆情的伦理秩序建构 ——基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

孙 越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因为网络舆情生成发展的内在机理、传播规律均不同于社会舆情,因而当前存在的粗放式规制、运动式规制、马后炮式规制等均不能承担网络舆情的伦理建构。网络舆情伦理建构的关键步骤是:(一)用“本质先于存在”的原则代替“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二)以技术实在论的伦理观作为网络舆情的伦理支撑;(三)采取补偿性为主,替代性为辅的责任追究方式。

关键词: 网络舆情; 食品安全; 伦理; 建构

中图分类号: B82-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6-0048-06

The Ethical Order Construction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Food Safety Issues

SUN Yue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China)

Abstract: Becaus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the propagation law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e social public opinion, therefore, the existing extensive planning, sports regulation, hindsight regulation, etc., can not afford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e key steps of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are: firstly, substituting the principle of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essence precedes existence”; secondly, taking the ethical view of technical realism as the ethical support of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hirdly, adopting the responsibility investigation way: the compensation is main, the substitution is auxiliary.

Key word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food security; ethic; construction

所谓舆情,是个人或群体对自身所处环境中某些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所持有的态度、意见、看法和认识的总和。网络舆情则是将这些态度、意见、看法和认识通过网络的形式表达、扩散和传播的过程。可以说,现在的网络不仅是个人传达自我认知和情绪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各种突发事件和热门话题的重要信息集散地,不可否认地成为了反映公众现实、探讨社会热点的主要载体之一。

然而,在积极有效传达社会热点、进行讯息便捷沟通的同时,网络自身也引发了不少显性或者隐性的问题。“当互联网的巨大功能被慢慢挖掘后,人们便会不加节制地去使用这些在表面上能带给人类非常便捷的能力,而最终则是私有财产的侵害和道德伦理的蔑视。”^{[1](p1)} 不得不说,信息时代,如何利用网络技术规范网络舆情,进行网络舆情的道德伦理建设,尽可能减少由于网络道德缺失所引发的社会代价,重塑网络安全,构建有效的网络舆情伦理秩序是当前网络舆情建设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在涉及国计

收稿日期:2017-05-15

作者简介:孙 越(1986-),女,重庆人,哲学博士,江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民生重点问题的食品安全方面,网络舆情伦理秩序的建构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网络舆情伦理秩序构建的主要要素

要构建良好合理的网络舆情伦理秩序,首先必须把握网络舆情所处环境的独有特点。与现实世界相比,网络世界的内在机理、传播规律、预警引导机制都有所差异。“网络能够隐匿真实信息的特点为个人戴上面具,法不责众的心理暗示令其不必担心受到惩罚,个人淹没于群体使其摆脱道德束缚。”^[2]从根源上解释,这是由于现实世界的支撑结构与网络世界是本质不同的。因此结合网络舆情的实际特点来分析网络舆情伦理秩序构建的方式,是构建将伦理秩序效用最大发挥的道德体系的重要保证。

(一) 网络舆情生成发展的内在机理

网络舆情伦理秩序的建构离不开对网络舆情生成发展内在机理的分析。准确了解和把握网络舆情的源起和生成特征,有助于构建合理健全的网络舆情伦理秩序。从网络舆情的表面现象分析,网络舆情多表现为参与网络舆情实践主体的作为与不作为的态度及相应的行为倾向。以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为例,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产生主要是参与某一食品安全话题的群众由于受到价值观念和自身利益的影响而表现出对某一食品安全话题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在该态度支配下对该食品问题采取积极或消极的行为方式。例如,2012年驰名全国的切糕事件,由于切糕的密度较大,因此单位重量相较一般物品较重,所以导致一些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付出了比预想价钱要多的代价。对于这一现象,在网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在讨论中大约有接近30%的网民认为,这是消费者自己贪图小便宜所造成的后果,本质上是合理的买卖行为,不存在所谓的食品欺诈事件。而大约70%的网民仍然认为这是一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强买强卖的现象。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异,加之在对该问题认识中受到不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导致关于切糕事件在网络上形成了两派不同的网络行为意见。持相反态度的双方分别结成统一战线,在为自己意见努力盖楼的同时互相讥讽,互为敌对。由此可见,网络舆情的内在生成发展机理本质上是技术高度发达的风险社会公众集体情感的释放。心理学称,人类天生具有使得自己认知结构保持相对不被破坏的倾向性。而一旦这种倾向性受到干扰破坏,就会产生关于某类事件否定性的评价和态度。为了维持这种情感上的平衡,人类必然会采取相应的舆论活动来维系自己的认知,通过网络扩大自己所持的意见,以获得更多支持及寻求心理上的慰藉。这让网络舆情的生成机理呈现出由点到面逐步扩大的态势和特征,因此网络舆情的伦理建构也必须是一种在从点到面过程中就有事中规制而不能单单是事后惩戒的方式。“事后的规制往往具有滞后性,从长远看还是需要事件发生时就能够开始寻求解决方案。”^{[3] (p197)}

(二) 网络舆情生成发展的传播规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现实社会中,人和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及其所形成的关系总和都将作为一个整体范式的存在。“现实社会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4] (p85)}但是与现实社会的整体性特质不同,网络舆情在生成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是呈现出去整体化的“碎片式”传播规律。所谓网络舆情的碎片化主要是针对网络舆情的传播语境而言的,人们通过网络关注自己想关注的话题,搜索自己需要的信息,高度关注社会公共新闻和自身息息相关的社会安全事件,但是在面对突发性的事件时人们并不能够知晓正确的信息来源,甚至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了解相关事件的真实信息,因而往往对事实一知半解、捕风捉影,这在某种程度上让网络的去整体化语境得到了加强。“网络的碎片式流行语有着极强大的传染性,往往容易产生跳跃性的节奏和瞬间变动的情绪。”^[5]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去整体化的网络环境在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网络舆论也成为社会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网络本身碎片化和去整体化的特质影响,在网络舆情中往往容易出现“英雄主义”和“原子社会”,也就是说在网络舆情中各种意见和见解都是以有着“博主”“版主”头衔的意见领袖来形成合意的,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力量来整理和引导舆论,网络舆情就如一盘散沙,难以形成认知和行动上的合力。而如果领导力量存在不当行为或者不当思想,就容易引发网络舆情正常轨迹的偏离,引起网络灾难效应。

二、以食品安全问题为例分析网络舆情伦理规制的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是网络舆情伦理规制和构建过程中具有典型困难的典型案例。“食品安全问题是现代化理论缔造出来的文化神话……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风险的社会,食品安全就是现代风险社会失控状态的一个典型特征。”^[6]网络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虚拟化的空间,相对于社会实体空间而言,网络的规范性和监控度都显不足。加之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尊重,很多网络空间都设有对个人ID的加密,使得在对带有犯罪行为的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监管过程中容易出现执法松散和无法追踪的困境。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变化和更新速度几何倍数的增长使得现有的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治理还存在着很多不足,具体说来包括:

(一) 粗放式规制

食品安全数据的发布主要还是必须依靠政府,而作为一项关系民生的重大公共数据,政府在发布相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和数据时往往比较谨慎,特别是对涉及一些食品生产销售机密的数据更是如此,所以往往导致数据的难产和残缺不全。这些数据的难产和不全便是粗放式规制方式的根源。

粗放式规制是指在有关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治理中采取放羊式的治理方式,即简单地从事表层寻找问题的浅层原因并提出并不涉及根本的解决方法,因此只能达到治标不治本的效果。当前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粗放式规制的原因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客观上讲,由于食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是一个系统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不同部门之间交流合作的磨合,往往容易出现权责不明晰的现象。从主观上讲,由于食品安全的相关数据繁琐而庞大,不同价值立场的人的解读往往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很难形成统一的价值导向。而相关部门自身由于对该事件掌控能力的不足,最终只能导致粗放式的规制,即往往表现为简单地做个网络说明或者封杀肇事者ID。然而实际上该做法并没有真正从根源上消除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隐患,相反大部分时候反而造成该话题的更加敏感。

(二) 运动式规制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运动式规制是指在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相关管理中并没有形成事先明确的条文规定和行为约束,仅仅在事情发生过程之中,就具体事情发生情况给出暂时性的解决对策的一种方式。由于这种解决方案往往只具有暂时性和片面性,类似于运动中主体位置不断的变化状态,故称为运动式规制。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之所以出现运动式规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其网络舆情缺乏主流价值导向,人们在虚拟空间的交流中认为网络空间可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从而为所欲为,最终走向虚拟空间价值虚无主义。由于不能真实准确地掌控被管理者的行为和思想路径,管理者只能采取运动式的规制方式,哪里出现问题就将阵地转移到哪里。特别是针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网络舆情,其话题由于与大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其关注点也自然不同,运动式的规制看起来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方法。然而,究其根源来说,运动式规制的作用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伦理构建中价值虚无的纵容——由于经常转变视角、更换方向,使得在食品安全的网络舆情中往往难以产生伦理道德的约束,经常的运动战也难以形成相关网络舆情伦理建构的主流价值导向。

(三) “马后炮”式规制

2014年7月20日,东方卫视曝光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将大量过期变质肉原料回炉重做或更改保质期等手段生产劣质食品(如麦乐鸡、汉堡等),并将之供应给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连锁店。同年8月7日,深圳沃尔玛洪湖店又被爆出使用煎炸半个月的黑心油,然而沃尔玛的相关负责人称,该门店今年已经接受了26次执法检查,而且每次检查都是合格的。直至此,通过媒体的大量曝光后,监管机构才开始针对问题加强执法力度,对有问题的企业和机构实施惩治,进行行政处罚和罚款。在这些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规制机构并未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履行其职责,乃至在有人向规制机构举报或通过媒体曝光后,相应规制机构也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而是在发生严重后果、已经酿成公共性事件之后才采取一些迟到的补救措施。类似于这样的行为被称之为是马后炮式的规制。

“从工具理性的视角而言,底层人民希望得到是成本小、时间短、危险系数低、极易可行、行之有效

的维权方式。”^[7]与食品安全的马后炮式规制相对应,关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在伦理和道德层面的监管和治理往往也显示出滞后性。往往是网络舆情被炒作到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人身安全的时候,才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例如封杀ID,删除不良言论,或者对肇事者进行行政或者民事处罚。“然而由于缺乏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监管,规制机构的反应过于迟滞,必然会增加社会风险性,也会导致国人普遍对规制机构缺乏信心。”^[8]

从对上述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存在问题的治理方式来看,往往只注重事后补救,不注重过程中技术和伦理的约束,特别是没有形成系统的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伦理规范和教育体系,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伦理道德建构任重道远。

三、网络舆情伦理建构的关键步骤

“网络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让人与人之间有了更为即时有效的交流方式,这点不错;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网络也导致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异化,它在去中心化的同时造成了人类过度的自我沉醉,沉醉到头脑完全虚无到一切。而这让现实的伦理准则在网络世界中彻底崩塌。”^[8]而正是因为网络环境的这些特殊性,使得规制网络舆情的伦理并不能照搬现实世界的伦理建构方式。网络舆情的伦理必须有一套重构的体系来适应网络自身的特点,以便从根本上起到规范网络秩序的作用。

(一) 用“本质先于存在”的原则代替“存在先于本质”的原则

“存在先于本质”在存在主义哲学中是指人类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和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在人的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遵守的必要,但是却有选择的自由。因此,萨特反对规则的预设,认为这是对自由存在本身的破坏,这样的观点被大多伦理学家推崇并提倡,特别是积极自由主义者,特别强调人自主选择的充分性和自由性,因此在西方现实社会中被广泛推崇。

然而网络世界却不能完全坚持“存在先于本质”的伦理原则,不仅是因为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也因为网络的个人英雄主义过于泛滥。网络世界的体验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体验,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观察、了解和思考掌握自己需要学习认识的对象,可以通过感官体验和思维认识去把握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但是网络世界的信息往往处于不对称状态,这让一些网络大咖、意见领袖的意见往往成为左右网络世界网民对事物认识的关键。通过网络大咖和意见领袖个人意志的加工,某些信息往往容易丧失掉自己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从传播扩散的开始就打上了“个人意志”的深刻烙印。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相比,从发起者到传播途径都是有着根本差别的。社会舆情由一定阶层占主导地位、发起并控制,在传播途径上主要依靠人员聚集传播;然而网络舆情的发起者和主导者都是没有归属或者归属模糊的大众群体,在传播上也具有虚拟性,难以辨别真假,这些使得相对社会舆情而言,网络舆情的生成机理十分复杂。如果还是坚持“存在先于本质”的自由放任原则,就难以控制相关舆情。我们必须坚持“本质先于存在”的道理,将以往的事后制裁变为事前规制,并注重对舆论发起者意志的矫正,以采取适当的积极的干预取代无大事发生就消极不作为的行为。网络的特点决定了一旦有事发生,就非常迅速直接,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不能像处理社会事件一样,待到事情发展到一定阶段才采取必要干预方式。一句话,我们不能让“自由”的幌子成为网络舆情伦理秩序丧失的借口。

(二) 以技术实在论的伦理观作为网络舆情的伦理支撑

在网络空间中,舆论的表达往往呈现非理性化。对于那些被多次转发、响应、评价的话题,即便含有夸大或者修改的成分,往往也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有效的扩散;但是对于一些没有被关注或者关注极少、也不怎么有响应、转发和评价的话题,即便内容再真实,也难以被扩散传播。由此可见,网络舆情的实践中,非理性往往压制理性成为主导舆情扩散传播的关键。

基于网络舆情的这种特殊性,应用于现实社会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的规制作用因受到网络世界虚拟特性的影响,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计算机伦理学家莱斯格说过“约束网络行为和约束社会行为不同,在现实空间中约束人类行为的主要有伦理规范、法律和市场关系。伦理规范和法律通过美德和规则引导规范人类行为,而市场通过利益导向调整人类行为。网络世界依然遵循现实社会的伦理架构,但是却把这种架构更多地限制在网络空间代码中,即建构互联网的程序和协议,并以此来约束和调整人

们的行为。”^[9] (p761) 莱斯格的代码就是网络技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本身的提升去解决因为技术运用所造成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技术实在论的网络伦理思想,通过技术(代码)体系、规范体系和市场体系的有效配合,将技术(代码)作为促成道德自律的主要方式,同时借助法律和市场的力量,对网络技术运用进行合理限制,使网络发展健康有序。

(三) 采取补偿性为主,替代性为辅的责任追究方式

一般而言,社会活动中设立伦理秩序,进行伦理制裁的目的是为了约束和引导下一次行动,从本质而言,这种约束和引导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行为方式,能够有效替代当前有悖伦理的行为,这样的伦理体系应用于实践中,可以说是一种产生替代性行为的伦理机制。社会中的伦理规范正是在不断地约束、矫正已有错误行为的基础上,寻求更为符合社会大众利益的行为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发展。可以说,现实中,运用伦理学原则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敦促引导产生新的可替代的行为,并将该种行为推广普及。普及的过程,既是关于伦理体系实践的过程,也是伦理机制自我检验的过程。

然而,网络世界却不能简单沿用现实世界的追责方式。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产生网络世界中的个人膜拜和英雄主义,从网络舆情的现实表征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网络世界中,对于某一个话题,网民往往一窝蜂地感性关注、评价之后就迅速消散,没有充足的时间形成理性共识,更不必说形成现实社会中牢固的集体心理范式。加之出于对网络公民利益的保护,有时候并不容易像现实社会一样,直观有效地追查到某一行为的具体发出者和实施者;即便追踪到该行为实施者的ID,其也可以通过ID的更换等技术手段来逃脱追踪,还不包括一些人采用虚假信息注册的ID。一句话,网络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是一个典型的、具体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它有自身独特的传播现象,其肇因是多元而又复杂的”^[10]。以原子方式存在的个人数量更多,这让现实社会中的伦理机制难以在网络世界发挥出应有作用——不仅因为原子个人和英雄主义引导下的群体往往带有非理性无序性的行为特征,更因为伦理应有的替代性追责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网络舆情中的各种伦理问题。网络舆情不像社会舆情,解决之后人们因为有了内心规约而产生新的集体行为意识,从而替代了原有的行为范式;同一种舆情由于不同的英雄原子个人的引导,可能会带动和引发换汤不换药的类集体行为。因此,想沿用现实的伦理实践机制,特别是使用伦理实践机制的替代性责任机制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根据网络环境的特点寻找适合网络环境自己的追责机制,再辅之以替代性责任追究机制来完善网络伦理实践机制。针对网络的原子式个人和英雄意见领袖特质,我们建议以采取补偿性为主,替代性为辅的伦理机制。补偿性的伦理机制是对某一行为特质与现实不符合或者有违背处采取纠正方式的伦理机制,如果说替代性的伦理机制是一种先破后立,注重“立”的方式的话,补偿性的伦理机制则是边破边立,它更注重“破”的效果。换言之,它不需要替代行为的出现,它更多需要的是怎样规约同类行为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 [1]理查德·斯皮内洛.铁笼还是乌托邦[M].李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张爱军,孙忠勇.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J].行政论坛,2016(5).
- [3]洪巍,吴林海,等.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发展报告(201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5]John Paul II,Message for the 33rd World Communications Day[N].n.4,January 24,1999.
- [6]曾鹰.风险文化:食品安全的伦理向度[J].伦理学研究,2012(6).
- [7]邱新有,叶旭洋,余秋雨.网上民间新闻发布会的概念建构与社会意义——兼论文明维权的新模式[J].贵州社会科学,2016(8).
- [8]杜仪方.风险领域中的国家责任:以日本预防接种事件为例证[J].行政法论丛,2012(1).
- [9]Harold Reeves. Property in Cyberspace[J].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96(2).
- [10]段忠贤.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及治理对策[J].贵州社会科学,2016(4).

(责任编辑:余小江)